



##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

我在参观西方的旅途中思考着有关日本文化的问题，认为日本人与其研究西方，不如研究日本，凭借这种研究来推动自己的工作，在学术上才会是具有建设性的。另外，日本古来的文化在今天方方面面所遇到的问题，也未必见得不如西方文化诸种问题重要，相反，倒是有一些尤其耐人寻味的东西。这些问题未能受到足够关注与探讨，纵然有其种种理由，但在我看来起码也是一种怠慢。从现在起，我打算改变这种怠慢。以往的日本，还有如今的日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关注探讨的东西？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都会逐渐明朗起来的。这里，若只笼统地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当我参观完西方回到日本的时候，我的想法在原则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严格地说，我的基本观点虽未改变，然而就日本文化的一般层面上而言，我在西方参观途中的想法与我回来之后的想法二者发生了若干内容上的错位。这个错位就是，日本人必须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也就是说纵然以实现西化为目标而努力，也解决不了日本的问题。我既然确立了这样



一个思考原则，那么，便涉及到这么一个内容：何谓日本人的立场。在参观西方的途中，我的思考方式是纯日本式的，其内容毫无西方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假若将西方的影响自技术层面剥离出去，那么，不论是在精神方面或者是文化方面，我认为其影响均仅停留于表面，是极其肤浅的。当我观看身旁西方的街道时，觉得与东京的西式街道似是而非。假如说日本有什么与此相似的东西能让我想起来的话，无非是那拥有悠久的历史并已成为独特式样的京都那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屋宇。不仅是街道，如果有谁真的把塞尚的仿作与塞尚的真品相比较，一定会被认为是犯傻而无人理会。说到绘画，在参观西方的旅途中能让我想起的日本画家，也就是北斋与光琳。那时，那种植根于日本的风土与悠久历史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对风俗、习惯和艺术的全部作自觉把握的内心冲动油然而生。如果这种冲动可以视作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么，我在参观西方的过程中，思考的所谓日本人的立场，其内容就是民族主义的。并且，在英法逗留期间，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对待本国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愈发激发了我的这一念头。这一类例子早已有见诸文字，恕我不再赘言。总之，在英国，英国式的特征从学术领域直到服装、生活方式的细枝末节以一贯之。英国的文化全然不似日本文化那样杂然并存，医学是外国的，美术也是外国的，而生活方式却是日本的，因此，它各个方面都无需自卑，从容不迫地背负着悠久的历史。把英国换成法国，情况也大体相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英国与法国不存在自卑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至少相较日本而言，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是纯粹由自己传统的东西孕育起来的。凡是到过这两个国家的人差不多都会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英国



与法国，人们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对外的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但在很多情况下，在并不是出于对那种于自己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原理的寻求，而只是通过接触外国的东西来丰富与发展自己已有的原理。就原理本身而言，不论是英语文化抑或是法语文化，都属于纯种文化，而英语除了受过法语对它的影响，几乎未曾受过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且，很多英法人士对此多多少少都有所自觉，因此，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便发达起来。对心理学若有兴趣的旅行者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轻而易举地便可得出以上的结论，日本人也须像他们那样，在文化选择的问题上取民族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结论不过是老生之谈，现在即使是我，在西方参观时，也倾向于这种结论。然而，这是错误的，这样说或者有点夸张，我在回日本的轮船上，当我站在甲板上，开始眺望到日本海岸的那一瞬间，豁然明白了这些。

当时，日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耸立在大海中的山、傍水的松林、隐约可见掩映在松林中的渔村白墙，这是一个在水墨山水中被充分描绘过的美丽古老的日本，属于与西欧迥然不同的一个世界，此是其一。而另一方面，当轮船从玄海滩驶进关门海峡时，右弦方现出北九州的工厂区，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炼钢炉里烈火熊熊，这便是由勤劳活跃的日本人民建设的所谓“现代”的日本，是一个与东南亚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神户上岸的时候，我的印象也仍是一样。神户不同于马赛，也不同于新加坡，从外表上看，新加坡比神户更像马赛，因为新加坡是殖民地，新加坡的西式街道并非是马来人出于自己的需要而用自己的双手建造的。对于这些殖民地国家来讲，问题在原则是很明白的。不管殖民地也罢，独立也罢，外国进口商品



也罢，国货也罢，而一旦文化成为一个问题，争论的方向大概只能朝着纯粹的民族主义发展。然而说到神户，问题便不那么简单，码头上的栈桥、起重机、街道上西式建筑、风俗习惯，无不是日本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亲手建成的。新加坡的西式风物，是为了西方人、处处按照马赛の様式建成的，一丝也不差，而神户则是按照日本人自己的尺寸量身制造。以这样的方式使西方文明在亚州植根的，恐怕除了日本外别无他国。它和马来西来不同，和印度与中国也不同，这种不同比起日本与西欧的不同，当我刚从国外回到日本的时候，则尤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欧洲的时候，我将西欧与日本相比较，总是喜欢将日本自有的一切，当作传统的東西来考虑，然而回到日本再一看才发现，日本自有的东西与亚州其它国家的都不一样。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西方化已经进入了深层。这并不是说，我的注意已从传统的日本转向了西方化了的日本，不是。我开始认识到，日本文化的特征，正在于这两种要素在深层上的纠结、难以互相分离。换言之，倘若我们把英国与法国的文化当作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那么，日本文化便是杂种的典型。

在这里我使用“杂种”这个词并不带任何褒贬的意思，对于“纯种”亦然。假如站在褒贬的立场上看，纯种也有弊端，杂种亦有益端；反之也如此。但是在具体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明确：我们是在最本源的意义使用杂种这个概念的，而不是在细枝末节的意义上使用。说到细枝末节的影响，英法文化并非没有受到过外国的影响，印度、中国更是如此，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将日本文化作为杂种的典型特别区分出来。（印度与中国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据我目前所了



解到的它们和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别。)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若想了解西方的文化是多么深的养育了日本文化的根，只需从所有企图把西方的文化连根清除的日本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极端的精神主义者——这个事实，便可得到证明。鼓吹诸如日本精神啦、纯日本风格的文学艺术啦之类的虽然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人们却不会去鼓吹纯日本风格的火车，一般都是精神方面的东西。今天，即使是那些竭力提倡日本传统文化的人自己，用的也是钢笔，而不是毛笔著书写字，出版的也都是洋书而非线装书；至于在图书的畅销方面，人们则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在英国最为典型而发达的，在日本被称作为所谓“扭曲”了的资本主义机制的作用。人们或许日常家居的时候穿和服，一旦外出就换上西装，也就是说，西方的文化已经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形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教育及其它制度、组织的大部分形式，都是以西方的形式为准绳而制定的。再噤嗦一句，在经济基础方面尽管还留存在着某些“前现代因素”，然而在毕竟已经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今天，还死死认定精神与文学可以单纯日本式地发展的，大概只有那些极端的精神主义者。日本主义者必定是精神主义者，无论日常生活与经济基础如何，他们总是认为，精神独立于这些内容并创造着文化。然而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观点赖以成立的基础、概念本身，大多便是从西方输进来的，和所谓的日本风格相去甚远。像自由、人性、分析、综合这样的概念，不使用它们就想说服他人，形成理论，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是由论题本身决定的。那些企图清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回归日本传统的日本主义者的精神世界，本身也是由翻译而来的概念培育起来的“杂种”，这些概



念一旦被消除，他们的思维活动想必立刻便要停止。因此，这种企图把日本的文化传统从外国的影响中区分、剔抉出来的做法，在今天的日本是根本行不通的。

还是大众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对杂种能够原封不动地整个消化，尽量想方设法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谁也不会疯狂地要将杂种纯粹化。倒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总是耿耿于怀，他们愈是意识到文化问题，愈是对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报以微词，一有机会便欲将其纯粹化。明治以来错纵复杂的文化史，一言以弊之，便是知识分子对这种文化杂种性的反应，便是一部文化纯粹化运动的历史，因之它必然的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 二

日本文化的纯粹化运动，姑且可以分为这样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建立在将日本文化的枝叶剪除、全盘西化这样一种意愿上；第二种类型恰恰相反，是建立在将西方种的枝叶剪除，保持纯粹的日本文化这种意愿上。但是不论哪一种都是无法达到目的，以剪除日本种的文化枝叶为目的纯粹化运动即使实行得很彻底，也不可能真正去除那种孕育了日本文化之根和树干的日本元素，即使暂时剪除，不需多久，日本种的枝叶便会重新生长出来。接着，必然又会发生剪除西方种的文化枝叶，重新按照日本的格式加以整理的运动，但是这时，树干、树根的杂种性已经无法理清，令人束手无措，不久又会长出西方种的枝叶，根本无法根绝。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连锁，无休无止，循环不已。明治维新以来，一旦发生要将日本文化纯粹西



化的风潮，就立即会出现弘扬国粹的逆反运动，两种倾向交相迭起，迄今犹未消歇。

断绝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管它是纯粹日本化还是纯粹西方化，姑且将那种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念头统统扔到一边去，并且承认这样的一个前提：英法文化是纯种的，那就由它是纯种；日本文化是杂种的，也就由它是杂种，即使现在还有些问题，日后好好培养，使它完美起来。可能有人会问，这办得到么？然而，不这样尝试一下，便无从见出分晓，舍此更无他法，图解式地说，结论就是如此。当然，现实的问题远比这个图解复杂。因此，在得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具体回顾一下日本文化纯粹化运动的历史状况。

日本同西方文化的碰撞，是在明治维新前后，由于外部的强制与内部技术上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刺激而造成的。在明治维新的思想中，就一般来说，尽管吸收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过程和民族主义的理想之间已经包含了对立的因素，但总的来说，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纠缠，难解难分的。当时认为，西方文化主要是技术文化，技术文化作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具有使自身强大的作用。和魂洋才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思想和强兵富国的理想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一旦超越了技术层面到达精神领域，它就同强兵富国的理想发生冲突，并且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唤起民族主义的反作用。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基督教的输入，当时，由于反对的力量是如此之强烈，基督教的影响可以说只停留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倘若当时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后来的日本文化史恐怕便要改写了。但是如果一定要作这样的假设，明治时代或许已经太迟，因为基督教在日本



布教的机会，并不是晚于十九世纪末的东京，而是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九州便已丧失。)

然而，当技术制度的引进达到一定的程度，引进的事物开始自发运作时，虽然它不像基督教那样，直接令接受的一方产生精神上的变革，但是也必然会间接令生活情感上产生变化。于是，风俗习惯开始改变，道德同审美意识也多多少少从传统中偏离，和魂洋才这个口号，如果再像文明开化初期那样来提倡，未免就太过简单，难以成立了。这时，和魂必须有意识地坚守，并且，除了纯技术领域，要对所有的西化进行对抗，方能坚守。作为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一种类型，民族主义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

一种类型出现之时，同时也是另一种类型出现之际。技术引进的下一步，为了使输入的技术制度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相应的思想输入也就此开始。洋才与和魂的矛盾促进的人们对洋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遂演化为一场将日本文化全盘西化的运动。譬如西洋音乐和日本民族音乐，西洋画和日本画，几乎以水火不相容的姿态对立着。既然在情感与审美意识领域里业已如此，同样的原因，不可能不波及道德和其它社会各个领域。倾向于将日本社会西方化的观点，不久之后随着历史主义的介入，终于获得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按历史主义史学观来看，日本的西方化即是日本的现代化，理由是，在按顺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西方处于先进的阶段，日本处于落后的阶段，落后就必须赶上，就必须清算日本社会中的封建性与前封建性，就必须实行彻底的现代化。要使文化纯粹化，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便倾向了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于是，两种倾向各执一端，其对立越演越烈。



从近期的文化运动中表明出的各式各样的对立因素，比如传统的趣味和更新的趣味、非历史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的思维方式、对社会所持的保守立场和激进立场来看，这种对立因素的大部分，倘若从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可以将其还原为以上两种类型，即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以明确的方式与最大规模出现的，不用说是在战争和战后被占领期——尤其是初期的那些日子。（狭义的讲，初期指的是战败一直到四七年的二·一罢工镇压，宽泛地划分，则是指战败后到五〇年的朝鲜战争爆发，这里重要的不是讨论两种划分的不同。）直到战前，国家权力并未曾以有组织的方式介入文化的各个领域，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黷武政策的教育固然非常彻底，便如在思想文学艺术领域，必要时政府也采取相应的箝制措施，但并不带有战争时期的“精神总动员”那样强迫的性质。可以说，将文化建筑在日本传统的基础上并希图加以纯粹化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杂种性的反应，而与大众并无多少联系，政府对此也并不积极。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精神也一起被动员起来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政治上强化国家主义的工具，得到了政治权力的积极扶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以宣传强调。这样，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便不再仅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喜好，而同广大民众开始有了瓜葛。而且，与这种“国民精神总动员”相较，战后的“日本民主化”是以极大的规模在完全不同的权力背景下展开的。在与大众的关系上，和战时不同的是，这次是获得了广大民众自发的支持——起码在某些方面可以这么以为。不管怎么说，因为战争的契机，文化问题开始得到自觉的并且有组织的处理。于是，出人意外的是，对于日本文化的性质所产



生的两种不同的反应——民族主义的类型和现代主义的类型，以高度典型、毋庸置疑的明确方式，相继登场。

假如将话题限定于思想与文学领域，战争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为了令战争合理化，在称颂天皇的同时称颂日本文化。接受与承担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京都的某一派哲学家与日本浪漫派。于是，这帮哲学家运用由西方哲学训练出来的方法，将天皇制“现代化”，假若只靠国学家们来装神弄鬼，那么对现代战争意识形态是无济于事的。所谓的“超国家主义”这种东西，其实不过是用舶来的道具拼凑起来的。对纯粹的日本主义者来说是极不合胃口，而且也决称不上是什么新鲜玩意，在明治维新时代的尊皇攘夷论的发展过程中，便已出现过这种情况。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尊皇论，向着与封建性相对立、并努力创造现代化革新的国家主义的尊皇论发展，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凭借传统的日本文化遗产，就连炮制出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都做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时，国家这个概念是由“先进国家”根据历史制造出来的，那时，原则上之所以通行和魂洋才的提法，不过是当事者自己的主观想像罢了。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当时需要输入的，已不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根据这一技术制度的需要，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个已西方化了的统一社会，还需要输入国家这样的一个概念。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战争时代里，朴素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被普遍化、合理化，遂产生了炮制“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需要。如此一来，国学作为方法自然无法当此重任，于是那些曾经受过德国哲学影响的京都哲学家们便被“动员”起来，



又是如获至宝地运用辩证法，又是现成地运用地缘论政治学，如此这般，为之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什么的，岂止是日本原有的东西，简直是个时髦的东西。纯粹从传统的框架概念中探讨诸如日本和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使命这样的思路，在当时并没有出现。说到装神弄鬼唬弄人，我至今能亲切地回想到的，为这套把戏上当受骗的，只有几位天真的文学家。

日本浪漫派和京都的哲家家一样，虽然含有颇多的时髦成份，但是比及那些哲学家，他们做得更彻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文学界没有强劲的对手，左翼文学在战前就早已遭到镇压，业已销声匿迹，因此当时的文学已经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不仅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而且自传统的日本文学中几乎没有继承任何东西（既然连日本的传统什么都未曾继承什么，就无须讨论从国外的传统中继承了什么东西）。不论是在思想方面或者是美学方面，几乎看不到它带有任何可以称作背景的东西。作家们用一种方言报导他们的私生活，供文学爱好者阅读，而圈外的人由于生活经验与关注对象的不同，即使读了也不得要领。可以说，这是战前文学的特点吧。但是，日本的浪漫派却正是在大众把希望投向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而需要的天皇制的时候接受了天皇制，并且标举日本文学的正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修辞法。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文学拥有一种思想与美学的背景，通过描述大众关心的对象，恢复了文学与大众的联系，而且，这个工作并非由西方式的逻辑与方法完成的，反而是由那种不尽合理而独特的日语修辞法做成的。正由于如此，将日本文学予以日本式的纯化这项工作，至少在形式上是完整的——在文学这个特殊的狭小的领域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能。尤其是当文学的



思想背景是在政治权力的保护下，读者对其可靠性深信不疑的时候，尤其如此。然而，一旦这些条件丧失，即战争结束，日本浪漫派的理论中就可以用来说服怀疑的读者，回击反驳的立论，为维护自己的立场而不可或缺的逻辑便明显地不存在。随即暴露出，那种独特的日语修辞法，对于战后日本面临的所有问题已毫无用处。试图将日本文化向日本传统的方向纯粹化的日本浪漫派运动，依赖战争这一特殊的条件才获得了一时成功的可能性。所在，它的忽然完结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它的自身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必然夭折的决定性理由。把传统的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影响对立起来，以图维护传统这种思维方式，是注定要失败的。人们终究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社会早已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化了。这种思维方式最终会变成反动，因为如果抗拒西方传来的文化元素，结果只会妨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变为反动的大概只有这种情形：不论哪个作家怎样设计他的时代，最后都只能像永井荷风那样，走上逃避时代与社会的道路。

不能简单地认为，战后的日本的“民主化”过程，是对战争中民族主义的彻底推翻。不论如何，政治权力的强加总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占领军确实是在战争刚结束不久的那段时间里，强迫了日本的统治阶级实行民主主义，但并不是对民众实行这种强迫，因为向大众强迫大众的权力，这句话从意思上讲不通。虽然在战争中，政治权力并没有强迫统治阶级违反他们的本意，但却强迫人民大众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权力。战时和战后两个政权的实质性区别就在这里。但是，这件事倘若从大众主观的角度来考察，未必就意味着大众在主观上对战争意识形态是抵触的，对民主主义是积极拥护的。事实不尽如



此，战争时期，至少是在初期，许多民众是自发主动地接受了战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觉得这是强加于自己的。但是主观上感觉不到这是强加的，就强加的那一方来说，无非是说明强制的手段高明罢了，不能因为欺骗得巧妙，就说它不是欺骗。而战后的民主主义不是欺骗，而是使民众觉醒。和欺骗不同的是，所谓觉醒，就事物的本质而言，觉醒的一方成为主体，所以，与其说是外在的影响唤醒大众觉醒，不如说是民众在外来影响的帮助下自己觉醒，这更契合事情的本质吧！不管怎么说，就民主主义是在民众自发的运动支持下发生的这一点而言，它和作为战争工具宣传的民族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因此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实际上，由战后的民主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变革，其中一部分恐怕已经具有一种无法返回最好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涉及）。

但是，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如果这样说有些不妥的话，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对日本的民主化问题总是倾向于用上面那种谈及到的历史主义思路来考虑。如此，所谓日本的民主化，也却致力于日本现代市民社会的建设。在他们看来，现代市民社会，具体地说，仅指西欧与美国，也即我所通称的西方社会，因此，民主化即现代市民社会的建设，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推演出日本的西方化，和封建的日本与现代的西方的对比。学者们一方面尽力证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是多么的合理和合乎人性，另一方面又分析日本的“现代”是一种遭到了多么大的扭曲的“非典型”的东西，日本社会中还残留着多少封建性的，或者前封建性的，或者通常说来前现代性的东西。一分析便趋于夸张，对西方过分褒扬，对日本过于贬抑，至少给人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如果由此而认为：实行西方化是日



本的当务之急、万事惟此为重，那么，这种看法其实不过就是战时的日本文化主义的翻版。甚至有人会说：日本社会中古老而不合时宜的东西都是封建的，不，日本社会里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不合时宜的，电影里，母女俩意见发生冲突时，女儿准会说，所以呀，妈就是封建呢。再往前三四年前，儿子则会夸夸其谈地道，所以呀，老爸不理解新体制哩。但是，正如过去早已论及过，如今仍在强调的那样，现代化的必要，不仅只体现在社会结构与道德方面，而是在所有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日本的”这一形容词乃至产生一种劣等感，其中还包括了小说的结构。富于进取性的作家们事实上已尝试着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移植到日文小说里。

我以为在这里有着双重的误解：第一，日本社会的很多不尽如人意处，并非都是由前现代性造成，不如反过来说，在很多时候它们是由那种现代性——即社会在某一方面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所带来的结果，并且，这种不尽如人意处也并非都是“日本式”的愚蠢行为。如若做母亲的对女儿过于严厉，不能充分理解她们，这确实不妥，然而这种不妥既不是因为母亲封建，也不是因为日本的缘故，因为是母亲才会这样的。倘若认为日本社会实现了现代化，母亲就能理解女儿，婆媳之间的矛盾就能迎刃而解，这未免太过夸张，夸张过了头，就会对社会造成误解。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替日本式的家族制度辩护，说它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不管它有没有好的方面，但它的坏的方面却是致命的。我认为对于传统的家族制度是应当尽一切机会加以破坏的，不过这并不是要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归疚于日本式的家族制度。因为即使社会实现了现代化，这一类问题大概也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婆媳间的矛盾纠葛，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理想的现代市民社会里或许是不应当存在的。然而这样理想的现代市民社会，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任何地方也未见到过。有的人觉得这样的社会日本虽然没有，外国也许有，这是误解的第二方面，其中还包含着对西方社会的误解。有这样一种看法：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的发达在英国最为典型，而这些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早已同那种典型性相游离，因此是一种被“歪曲”了的东西。这种说法，只要还处于客观分析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典型的”啦、“被歪曲”啦，这类词语只要不掺杂价值的感情，就很难有反驳的余地。至少在客观分析的范围内是有能够加以严密论证的。然而，假如话题从资本主义与议会制度的发展史转移到英国的个人主义的确立这样的题目上来，仅仅只是对客观史料作客观的分析，几乎就不可能进行。误解于是从这里产生。而一旦误解产生，那些诸位英国通们除了继续说些加深这些误解的话，已别无高论。这就像以前的中国通常说中国人人种不行一样，英国通说英国人比日本人优秀。然而，中国人决非劣等人种，英国人身上虽然有无可争辩的优点，然而就像从前曾在英国生活过的一位富翁的儿子说的那样，英国人并非人人都像贵族学校寄宿生那样彬彬有礼，也并非都像《时代》、《曼切斯特·保护人》的社论委员那样，对国内外的各种政治问题随时准备好了精辟的意见。一位十分了解日本的英国人曾经这么说：为什么日本人总是认为，日本的一切都不好，英国的一切都好？要是有人说了什么反对的意见，便听了立刻就不高兴。

所以，产生出对这种现代主义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以文学为例，一些没有读过几本书的家伙，竟然声称，日本传统文



学就是私小说；那些仅读了一些浪漫派作品的人，也许还不知道会从哪个角落翻出一些稍微像样的东西；并且，这种反动最终总是以极不彻底的方式结束的。不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文化从根上上说就是杂种文化这个事实，总是要避而不肯正视，不看作问题的依据，仅试图在观念上加以纯粹化，但他们都只停留在细枝末节的操作上。原因就在于在纯种面前怀有一种自卑感，因而无法把握问题的真正所在。真正的问题应当是，承认文化的杂种性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并且探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那么，文化的杂种性真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吗？我想毫无疑问。但我从来都不奢望会听到这种恭维话，说那正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 三

我曾说过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但是并未说到另外一个欧洲文化的王国，即德语文化。其间的原因，只要用两三个例子对德国和法国作一番比较也许就清楚了，例如歌德和拉辛。孕育拉辛的，是古希腊、罗马、法兰西的所谓纯粹的拉丁文化系统，其它系统的文化，对他的文学并无丝毫影响。而歌德的世界则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古典主义、英国的浪漫主义培育而成的，到了晚年，甚至连近东的东西都吸收到他的创作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争论哪一种文化更加优秀并无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歌德向人们昭示了，仅仅是纯种文化算不上文化这样一个事实。不过，所谓的德国古典主义



文学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之间，时代隔阂极大，并且，可以大体认为，歌德是德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例外。自歌德与拉辛的比较中所得出的德法文化性格上的差异（仅是差异并非是价值的高低），在其它许多场合也大抵适用。譬如康德和卢梭，海涅和波德莱尔，托马斯·曼和瓦莱利，这种差异到今日仍基本未变。德意志文学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杂种的因素。这里无暇就一个个作家进行分析（这其实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题目，若同法国做一比较，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德国显然是杂种的，同时也显示出杂种未必就不好，不仅是文学，在音乐上，发明对位法与和声学的并不是德国人，然而从巴赫一直到瓦格纳，德国的音乐举世无双，再也没有比它更加丰富的音乐王国了。

当然，德语文化是西欧的文化，即便是杂种，也仍然是在那个框架之内。当超越这个框架的时候，杂种混合会呈何种情况呢？这可以从十九世纪的俄国找到例证。尤其是契诃夫，从他和今天的日本的关联中，人们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以前写过文章（《新日本文学》一九五五年二月号），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契诃夫受到了西欧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混乱的十九世纪末的俄国，这种混乱成为他思考的绝好材料。透过这种混乱，他将笔触深入到当时的欧洲文学尚未注意的人性的深层加以表现。但这并不就是说，他的主人公们受到当时欧洲的影响，而他自己则不受这个影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契诃夫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们的不同无非在于，作家所接受的欧洲文化的影响，相较主人公对西方的崇拜来说，具有无法比拟的深度。契诃夫将其杂种文化之根一直向深处延伸，一旦达到了其中的最深层，人性中普通的一面，即已无法